

浒 浦 镇

季达甫开店建立地下联络站

季达甫，1906年生，浒浦镇邓家坝人，经商。1986年病故。

20年代，常熟城里周生泰腌腊店年轻职员季达甫，平时很活跃，经常出入公共场所，熟悉很多人，虽没有文化，但能说会道。1929年被中共地下党同志看中，派人秘密同他接触，动员他参加革命活动，季一口同意。之后，他白天在店里当营业员，晚上外出活动。当时地下党同志的活动一般在虞山北门言子墓和联珠洞进行，季达甫多次在外边放哨。季有时还为领导送密件；有时又趁黑夜在大街上贴标语、发传单。后因内部出现了叛徒，季和同伴曹根元一起被捕，经亲友卢喜买通公安局长将其保释出来，在浒浦邓家坝老家开茶馆。过了一段时间，季又与组织接上关系，并接受组织指示在浒浦开腌腊店，作为一个地下联络站，经常有人来接头联络，开展秘密活动。

史料提供人 徐永达戴桂珍 核实整理人 钟锡仁

茹文德建立地下交通线

茹文德，1903年生，无锡人。在浒浦经商，曾经营“三德轮船公司”。1984年病故。

1937年，锡沪公路、沪宁铁路一度中断，内地大宗物品及行人来往上海十分不便。在浒浦口由茹文德与上海的荣氏家族联系，借英国太古轮船公司名义，在浒浦分设一个“三德轮船公司”。当时英轮“凯司登”号、俄轮“亚历山大”号等都是上好的船只，来往于浒浦、上海之间，货物、乘员十分拥挤。“三德轮船公司”的职员大部分

是倾向革命的热血青年，当时巩启仁、沈雪侠、肖德新等都在公司内任职。除将常熟大米、布匹运往上海，上海的工业品运回常熟外，后来还为苏北新四军的给养、药品等运输起了较大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便利南来北往的革命同志，由茹文德出面，通过关系从伪军头目徐老六（耀青）处设法搞到 20 张“良民证”，又买通在浒浦的日寇洋行经理三本、翻译项益泰，使一批批地下党同志安全通过。当年的浒浦口轮运成了一条地下交通线。

史料提供人 茹义德 钟培锋 核实整理人 茹振球

三青年痛打伪区长

巩启仁，1908 年生，浒浦人，职员。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9 年病故。

茹成德，1910 年生，职员。地下交通员。1976 年病故。

张永和，1913 年生，商人，浒浦聚泰鱼行小老板。解放初病故。

1938 年的一天，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从浒浦伪镇公所工作人员处获悉，第二天将有吴市区伪区长来浒浦催捐。第二天，地下交通员巩启仁、茹成德和聚泰鱼行张永和等三个青年叫了 3 名身强力壮的店里职工守候在浒浦镇东的石人石马处（石人石马处原是周氏墓地，后渐作地名，即浒东村）。不多时，见一辆手推独轮车向浒浦方向过来，车上坐着一个身穿夏布长衫，戴着礼帽，手里撑一把阳伞，车后跟着一个侍从模样的人。巩启仁上前搭讪后，才知他原来就是伪区长，于是说些欢迎的客套话，假装命身边两个职工将伪区长请到附近三角镇茶馆休息。在对话中，当确认伪区长是来浒浦催捐时，巩启仁顿时脸色一沉，痛斥汉奸，接着几个职工围上去痛打伪区长和侍从，将阳伞丢到甘稞里，帽子甩到路边沟里，且厉声责问：“你还敢不敢到浒浦来催捐？”伪区长拎着扯掉钮扣的夏布长衫，躬身连连说：“敝人再也不敢，再也不敢。”滚回去，下次再来要

你的狗命！，伪区长灰溜溜地掉头回吴市去了。

史料提供者：茹文德、茹义德

核实整理人：茹振球

邓根松掩护新四军

邓根松，浒浦镇苏坝村人，一生种田兼做弹棉毡生意。

1939年至1940年之间，邓根松开的弹棉店的学徒徐顺和后来参加了新四军，当上了连长。由于师徒关系，邓家与徐关系亲密，来往频繁，时常有新四军指战员到邓家落脚。村上老百姓都晓得新四军是打日寇的，大家尽力保护他们，从不走漏一点风声。有一次问村的日伪分子徐林海下乡敲竹杠，向浒浦日寇警卫队密告。敌人出动了两个排的兵力向问村摇潭桥而来，被苏坝村张家巷老百姓看到，迅速告知正在邓家的新四军。新四军在徐连长带领下迅速转移。敌人到村后随即到各家各户搜索，结果扑了一个空。日寇强拉村民集中到广场，逼老百姓讲出新四军到底哪里去了。老百姓讲刚才看到一群人，从这儿走过，朝东南方向去了。鬼子恼怒之余，将群众季银根拉出来，逼他说出新四军的去处。季银根说：“我在烧饭，没有看到什么人来。”敌人威吓说：“你不说出来就打死你。”敌人拿起锄头朝季的背部垒去，当即鲜血直流，季银根仍拒绝回答。敌人未能逼出什么名堂来，日寇队长哨子一吹，溜回浒浦去了。

史料提供者 邓宝兴、张增贤

核实整理人 钟锡仁

王炳斌渔船藏朱英

王炳斌，1916年生，浒浦区浒西乡卢清浜人，以务农、捕鱼为生。1986年病故。

抗战后期，中共苏常太武工队队长朱英来浒浦一带开展抗日活动，经常到地处偏僻的王炳斌家落脚。因工作原因，同王炳斌的交往日益频繁，关系日益密切，感情也日益深厚，最终结成挚友。

由于地下党组织内部出了叛徒，朱英同志的活动，被浒西朱家湾的朱福元（后被地下党处决）向日寇宪兵队告密。宪兵队要捉拿朱英，这情报由开明人士告知了朱英。王炳斌随即将朱英带到渔船上，同他一起到长江捕鱼。当日寇宪兵队秘密下乡捉拿朱英时，朱英已活动在江面渔船上了。

史料提供人 茅凤祥 吴元元 核实整理人 钟锡仁

徐和尚夫妇掩护新四军民运干部

徐和尚，1916 年生，浒浦镇苏坝村人，厨师。

张宝玲，女，1915 年生，浒浦镇苏坝村人，徐和尚之妻。

1940 年，苏家坝徐家宅基是新四军活动的基点之一。村民徐和尚人缘好，朋友多。新四军民运干部在他家活动，进进出出，外界都认为是徐的同行好友。隔壁邻居虽晓得点底细，但他们都受尽日本鬼子的苦，谁也不泄露一点风声。民运干部开会、学习，有时商量工作，徐的妻子张宝玲就在屋前场上做活放哨，如有陌生人她立即发出讯号。徐的妻子还帮他们烧菜煮饭，洗衣铺床。有时民运干部外出活动，迟些回来，他们夫妇俩就在家做花边或纺纱等候他们回来。徐和尚夫妇就是这样真心实意地支持开展地下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史料提供人 张宝玲 季兴宝 核实整理人 钟锡仁

秦祖荫截获日寇十二船大米

秦祖荫，1917 年生，常熟浒浦镇问村人，初小文化。 1954 年 8 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以种田为生。

1941 年 3 月，秦祖荫由顾鉴修区长指派到梅李、塘桥一带负责设卡收税工作，另外还负责收集情报。当年秋天稻谷登场时，常熟城里龙泉内河公司（实际是日寇的公司）有一艘轮船拖挂 12 只

拖驳，装满大米，驶向浒浦长江口，秦祖荫等发现后，当即截下了船队，没收了其全部粮食，其中一部分分给百姓，一部分留给中共地下党抗日游击队。日寇恼恨之极，开了汽艇到塘桥报复，用机枪扫射住宅区。“民抗”部队奋起反击，打死鬼子一人。敌人见势不妙，仓惶南逃。在这次交战时，秦祖荫手臂中弹，后经组织安排回家养伤，伤愈后重返岗位。

史料提供人 秦祖荫、马友良 核实整理人 钟锡仁

张民权资助武工队

张民权，1918年生，浒浦东村人。解放前经营绸缎生意，解放后种田。1994年病故。

张民权待人和善，在浒浦镇小北街市中心开设天丰绸缎店，经济状况比较好，周围一带，如碧溪、吴市、东张、徐市、梅李、赵市等地的小老板常来购布料，生意兴旺发达。1945年至1948年期间，中共地下武工队大队长朱英等人，经常来浒浦活动，有时也要到张民权的店里“聊天”。当他了解到武工队经费困难后，便解囊相助，前后共资助50多担大米，受到了武工队的称赞。

史料提供人 徐永林、陈振明 核实整理人 钟锡仁

碧溪镇

张金囡顽强不屈保机密

张金囡，女，1916年生，徐市镇遥路村人，贫苦农民。16岁到碧溪周泾口张家做童养媳。

张金囡的丈夫张伟才，毕业于吴江师范，1939年参加抗日活动。张金囡积极支持丈夫的革命活动，经常带领妇女做军鞋，慰劳抗日战士。曾主动卖掉自家8分地，出面赎回一个被敌人抓走的革命同志。

1940年夏天，参加抗日部队的张伟才和战士在周泾一带从事抗日活动。白天经常隐蔽在芦苇丛里，张金囡负责给他们送饭。8月18日那天，被坏人告密。当天夜里，张金囡被敌人五花大绑，从徐市押到支塘。日寇把她吊起来凶残拷打，逼问抗日队伍的下落，张金囡一口咬定说不知道。敌人继续毒打，她仍是坚决不招。

在被抓的整整6天中，张金囡水米未进，面对种种折磨，她始终坚贞不屈。敌人无可奈何，只得将她释放。回家之后，张金囡立即通知张伟才等离开周泾，并嘱咐他到革命胜利之后再回家团聚。不久后，张伟才在高邮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张金囡独自抚养子女，坚决革命到底，终于在1954年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史料提供人：张金囡、马文华 核实整理人：王群宇

顾敏母女保存革命书刊

顾敏，女，1924年生，碧溪镇包米村人，贫苦农民。194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抗日民主政府包米村村长。离休干部。

40年代初期，在常熟县抗日民主政府江城区负责教育工作的

顾敏，曾收阅过一批由东路地区江南社出版的抗日报刊和图书，其中有《江南》月刊 11 期，《大众报》11 期，《东进报》半张(三、四版)，政治思想读物 28 种，以及有关军事论著、文教读物、文艺读物、群众工作等方面的书刊，共计 60 件。1941 年 7 月，日伪在东路地区开始“清乡”，顾敏意识到这批报刊、图书是革命的珍贵资料，决不能被日伪“清”去，于是她就同母亲将这些书刊砌入墙壁中。解放战争期间，为了避免这批书刊被国民党查获，顾敏的母亲又将这批革命书刊放入一只坛内，埋在竹园地下。于是，这批书刊终于保存了下来。

1956 年 5 月 15 日，顾敏将这批书刊全部捐献给江苏省博物馆筹备处，后由南京博物院收藏。

史料提供人 顾敏、黄增元 核实整理人 徐学东

叶起生机智掩护地下党员

叶起生，1910 年生，碧溪镇周泾村人，解放前开米店、油坊。

1994 年病故。

抗日战争时期，叶起生开的米店、油坊，成为中共地下党的情报站、联络站，叶起生还经常资助地下党活动经费。

1943 年秋，武工队朱英、江其生、俞玉铭等刚到达叶起生家，因走漏风声，日寇就带着翻译赶往叶起生家捉拿。敌人行至野菱浜正好遇到叶起生，翻译不认识叶起生，问油坊老板在何处。叶机智地回答在作坊里。然后迅速回家通知武工队同志隐蔽起来，敌人扑了空，油坊房子被日寇烧去 2 间。虽然损失很大，可叶起生依然不断资助和掩护地下党同志。解放后，他被推选为人民代表出席常熟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史料提供人：叶春龙、王瑞良 核实整理人：王群宇

张金元勇斗四敌缴枪支

张金元，1927年生，碧溪镇干巷村人。1945年参加武工队活动，194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6月，张金元在唐市参加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武工队。他和其他武工队员一起，经常冒着危险为革命送信送情报。

1949年1月24日，中共苏常昆太武工队员顾根福召集张金元所在的白泥滙支部成员开会。会议在一条船上进行。会议刚结束，同志们就发现岸上有4个国民党士兵。张金元等灵机一动，派人联系高家巷支部的武工队员一起，将这4个国民党士兵团团围住，缴了他们的枪。

史料提供人 张金元 朱 英 核实整理人 王群宇

吴市镇

俞连兴奋勇斗日寇

俞连兴（俞小兴），1911年生，吴市镇马桥村人。人高力大，一身是胆，诨名“天老爷”。

1937年11月14日，日寇在吴市高浦口、徐六泾口一带登陆，烧杀抢掠，老百姓无不恨之入骨。日寇登陆十多天后的一天，俞连兴与同村一个叫顾大的村民从小市扛了一麻袋花生向西走。当他俩走到和尚浜坝时，遇上一日寇背着一支带有刺刀的枪从坝西走来。三人照面，日寇刚要举枪射击，“天老爷”一个箭步冲上去，举手猛力抓住了日寇的枪。“天老爷”的手掌被刺刀划开，虎口出血，他忍住剧痛，把枪口扭向了天空。顿时“天老爷”用尽全力将日寇推下坝去，摔进水里，等日寇从水中爬上岸时，“天老爷”已经离去。

很快，“天老爷”勇斗日寇的事在群众中传为美谈。

史料提供人 俞连兴 核实整理人 朱绍曾、杨绍球

杨乃荣领头创办吴市抗日小学

杨乃荣，1909年生，吴市镇西北街人。1930年苏州师范高师毕业，从事小学教育工作，后任吴市小学校长。抗战时期在家乡创办抗日小学，后又参加抗日活动。1992年去世。

1937年11月13日，日寇侵占吴市，烧杀抢掠，百姓四处逃难。第二年春，避难群众先后回家，在废墟上苦熬度日。其时，大批儿童失学在家，广大家长希望有一所自己的学校。当地青年教师杨乃荣，痛国土沦丧，恨日寇猖獗，悲讲台被毁，怜儿童失学，决心重建学校。杨乃荣先联络黄志云、唐善余，在自己家里办了两个混合班，收了几

十个学生，从原吴市小学校长夏哲欧处找了些旧教科书，自己编印了一些教材，开设国语、算术、珠算三个科目。上课半年后，由于学生逐渐增多，杨乃荣又联系市镇周边的教师，创办一所名为“联合私塾”的抗日小学。一面上课，一面宣传抗日救国。参加教学的除原有三位教师外，还有唐树德、吴均培、杨希孟、黄冠亚等。

抗日小学办起来以后，发展到 5 个班 200 多名学生，教材奇缺。于是派人到上海租界买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批复兴课本，秘密运回吴市，发给学生使用。同时发动教师编写抗日教材，油印成补充课本（后使用“民抗”编写的小学课本）。接着，全体教师公推唐善余主持教学业务工作。唐善余负责补充教材的编审，又亲自在复式班执教，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并和杨乃荣一起带领师生积极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学校组织了抗日儿童团，举办揭露日寇侵华罪行的报告会，教唱《大刀进行曲》、《好人要当兵》等抗日歌曲，排练抗日文娱节目。师生走向街头、农村，通过唱歌、演戏、演讲、发传单等，向群众广泛宣传抗日；还走街串巷，深入各家各户劝募劳军，对激发民众的抗日爱国思想起了积极的作用。

当时，北新闸、浒浦等地驻有日寇，不时出来骚扰。1940 年初的一个早上，一小队日寇突然出现在东北街，从一个儿童背着的书包里搜出一本油印教材，翻开第一面就有“火，火，火，日本鬼子放的火，血，血，血，中国人民流的血！”和“大刀、菜刀，齐杀日本鬼子”等语言，日寇就逼这个儿童领着去找教师。儿童无奈，向市中心走去，走到十字街口，他看见吴培均老师，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吴老师”。日寇拥上去一把抓住了吴培均。这时，有几个学生背着书包正从西街典当铺里出来，日寇就逼着吴培均领到典当里去搜查。

吴市典当铺房子很多，共有 127 间，由于典当被日寇抢劫一空，吴市小学就办在典当后面西边的一排空房内，东边许多空房里堆放些杂物。吴培均领着日寇在典当东边房屋转一圈，日寇未见学校踪影。吴培均想，抗战前总管殿曾办过学校，现在还有一些旧桌凳，要想掩护抗日小学，只有将日寇领到那儿，由自己一人承担责

任。于是，他领了日寇来到总管殿。日寇走进去看，除了十几张破桌凳外，其他什么都没有。最后，日寇将吴老师带到北新闸，凶残逼供，吴老师始终守口如瓶。后经人保释，吴老师才脱离虎口。

此后，抗日小学一度化整为零，转入农村，在树丫浜、总管殿、桑园、沈湾等处分散办学。1940 年秋，吴市一带成为抗日民主政权控制区，经地方教育界人士磋商，将分散在农村的学校集中到吴市镇上办学，选址在最胜庵，发展成一所完全小学。

杨、唐、吴三位老师在日寇面前坚持办学，坚持宣传抗日，这种高度的民族气节，热心培养教育下一代的高尚品德，永远受到乡亲们的称赞。

史料提供者：吴培均、杨乃荣、顾骋寰

核实整理人：王瑞兴、杨绍球

陆和尚毁家破财支持儿子革命

陆和尚，1880 年生，吴市镇砖场村石家坝人，农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全力支持儿子参加革命，并担任中共地下联络员。1951 年，被选为苏南烈属代表，出席全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1954 年病故。

1937 年初冬，日寇入侵吴市，陆和尚家与许多人家一样，房屋全被焚毁，只得搭了三间草棚栖身。出于对日寇的仇恨，陆和尚送儿子陆小康参加了“民抗”队伍。1941 年 7 月，日伪开始“清乡”，陆小康带领妻儿去了江北，留长女陆彩芬陪伴陆和尚在家。“清乡”期间，日寇、伪军要捉陆小康，没有抓到陆小康，就将陆和尚抓去，毁了他的家。日寇、伪军对陆和尚凶残拷打，要他供出陆小康的去向，他一口咬定“不知道”。后经花钱疏通关系，才被保释出来。

以后，陆小康经常秘密往来于大江南北，进行革命活动。陆和尚家成了地下工作者传递信件的一个联络点，陆和尚成了联络员，他先后传递过几十次信件，从未有过差错。

1943 年至 1944 年，陆小康几次和一些地下党同志从苏北来

常熟开展工作，将这些人员领到家中，请父亲安排住宿。陆和尚为保证他们的安全，将同志们分散到可靠的贫苦农民家中住宿。他总是要先到各家联系，落实好住宿与保护任务，然后才放心地把人送往各家。

1944年前后，常熟地区的武工队不断发展壮大，陆小康几次奉命从苏北运回武器，转交给武工队。运回的武器有步枪、短枪，还有手榴弹，每次都由陆和尚保藏好。他将短枪塞在菜箕堆里，长枪与高粱杆捆在一起，手榴弹藏在竹园里，用枯竹叶铺盖好，凡所保藏的武器无一损失。

抗日战争胜利后，陆小康随新四军北撤。1946年3月，陆小康又奉命从苏北回到本地开展工作。国民党反动当局得到情报，就在一天晚上，派出警察前往其家搜捕。陆和尚听到外面有人喊门，即叫小康先往南房躲一躲，由他应付来人。陆和尚开门出来，几个警察等在大门口责令陆和尚交出陆小康。陆和尚推说儿子未回来，警察哪里肯信，就要进屋搜查。其实，陆小康正躲在南屋，拿着手枪压好子弹，警惕地听着外面的动静。这时，陆和尚正与警察周旋，请烟请茶，警察还是坚持要搜查，他就把警察领向北房。陆小康听得清楚，迅即持枪冲出南屋，被场角放哨的警察发现，举枪向他射击。陆小康动作更快，随手一枪将警察击伤，夺路而去。屋内的警察冲出来，陆小康早已不知去向。他们未捕到陆小康，就将陆和尚带走。陆和尚被捕后，反动当局对他用尽酷刑，要他招出陆小康的行踪。尽管敌人的酷刑使他几次死去活来，但他始终守口如瓶。敌人无可奈何，结果只得将他交保释放。

1948年4月，陆小康在反“清剿”斗争中壮烈牺牲。陆和尚得到儿子的噩耗，对国民党反动派义愤填膺。他掩埋好儿子的尸体，化悲痛为力量，更加坚定了支持革命的决心，仍与中共地下党的同志经常接触，搜集和传送情报，为革命尽心尽力，直到常熟解放。

史料提供人 陆永生、陆春保、朱英
核实整理人 王瑞兴、朱绍曾、顾兆堃

王志平巧计夺枪

王志平，1915年12月生，吴市镇小市西街人。1933年毕业于吴江乡村师范学校，即从事小学教育工作。抗战初期投身革命，已病故。

抗战期间，抗日救亡运动在各地开展起来。许多爱国人士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宣传、组织工作。1938年2月，小市爱国青年王志平，将一些失业工人、店员和农村青年组织起来，成立小市抗日自卫队，人员从十多人很快发展到20多人。这支队伍活动在小市西北的俞家滩、汪家湾一带。

为了使队伍真正具有战斗力，必须有一定的武器装备和学会武装斗争。王志平一面筹划如何将小市镇镇长吴养一手下常备队的枪支夺过来，一面选派12名队员参加了由中共常熟县委在梅李塘桥举办的武装训练班。7月初，参加武装训练的队员回到小市后，王志平布置一些队员假称自卫队内部有矛盾，投奔吴养一的常备队，以伺机夺取枪支。9月份，王志平抓住吴养一和瞿正吾（常备队队副）去上海的时机，就在“民抗”武装人员的配合下，采取里应外合的突然袭击，将常备队的14支步枪、1支转轮手枪及一些子弹全部夺到了手。

小市抗日自卫队有了这批武器装备以后，大大增强了抗日自卫力量。

史料提供人：王志平、宣 焯 核实整理人：杨绍球、朱绍曾

刘耀宗为革命做联络掩护

刘耀宗，1905年生，吴市镇阮湾村人。1987年去世。

1939年7月，刘耀宗参加了“民抗”。10月，根据组织的指示，筹建了高浦乡抗日自卫队。他带领自卫队员，为中共地下党的革命

活动积极做好联络、保卫工作，又带领队员募集国民党军溃退时丢弃在民间的枪枝弹药，共收集和收买（由刘出钱）长短枪八支及子弹、手榴弹等，都慷慨交给抗日队伍。

日伪“清乡”时，刘耀宗被日寇逮捕关押拷打、坐老虎凳，他始终未吐露半点真情。后来，家中卖掉了三亩土地，通过多方活动，打通关节，才得以保释出来。

刘耀宗获释回家不久，日伪要他出任伪保长。他请示中共地下党领导怎么办？地下党领导鼓励他以保长身份为掩护，继续为革命出力。以后，他一直与地下党保持着联系，他家也就成为一个交通联络站。

一些革命同志经高浦口北渡时，总要在刘耀宗家歇脚，探明敌情，等候时机，才能越过封锁线。上级党组织派来的外地干部，如江其生、樊秋声、李涵真、吴善彤等，经常以刘耀宗家为落脚点，开展活动。1944年11月，吴善彤奉命来吴江区工作，在半年多时间里，都由刘耀宗安排食宿，在刘的掩护下，有效地开展对敌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北撤的党政人员回江南后，刘耀宗家这个联络站，来来往往的同志更多。当时地下党经济困难，需要向地方筹款。刘耀宗积极宣传和发动为革命筹款，并带头捐款。他还受组织委托，将筹集到的一笔笔款子全部收好，出具收据，然后列出清单，再转交给党组织。

刘耀宗在负责地下交通联络工作期间，为了不使敌人引起怀疑，就利用保长身份与敌人方面的一些人物交朋友，频繁往来，并不惜在经济上花费一些，做好各方疏通工作，把敌人始终蒙在鼓里。

史料提供人 刘耀宗 吴善彤 李涵真 夏仁华 核实整理人 朱绍曾

四队员紧急转移军需品

薛兴，1910年生，吴市镇小市村人，小商贩。抗战时期参加自

卫队，已病故。

徐庆，1918 年生，吴市镇小市村人，小商贩。抗战时期参加自卫队、新四军，1941 年牺牲。

费恒兴，1924 年生，吴市镇汪湾村人，农民。抗战时期参加自卫队。

薛源，1925 年生，吴市镇汪湾村人，贫苦农民。抗战时期参加自卫队、新四军，1946 年牺牲。

1939 年 10 月“民抗”为加强队伍建设，要求地方自卫队将主要的武器装备集中上缴。一天，小市自卫队把步枪 40 多支、轻机枪 2 挺、大刀 70 把、毯子 100 多条，放在小市西北树枝泾东岸的许三弟家，准备运到陆家市的“民抗”联络点。不料被小市匪首大金生得悉，大金生就与周泾口匪首李桂生、马桥匪首小九子串通一气，准备在当天夜里纠集匪徒百余人，分南北两路前来抢夺。时近傍晚，小市自卫队得到紧急情报，决定抢时间把这批军需品临时转移，立即派薛兴、徐庆、费恒兴、薛源等队员执行任务。队员们将许家对岸的一条泥船撑过来，迅速地把这批军需品全部搬上船，到天黑东西才搬完，费恒兴拔篙撑船离去。不一会儿，南北两路匪徒已经赶到，踢开许家的门，一窝蜂地闯进去，只见屋里除了一些破旧的家具外，其他什么都没有；再到屋外查看一遍，也未发现任何可疑迹象，只得悻悻而去。半夜，小市自卫队又把这批武器和军需品转移到了比较安全的陆家市。

史料提供者：费恒兴、范元 核实整理人：朱绍曾

机智的水上交通员李振亚

李振亚，1910 年生，吴市镇汤桥村人，贫苦农民。曾在吴（吴市）常（常熟）水运班轮船上当售票员。1995 年去世。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吴市至常熟建立了水上交通线，常熟、古里、苏家尖、董浜、天主堂、徐市和吴市各站，都有中共地下党

的联络员。李振亚经常来往于吴市至常熟城内的水上交通线，地下党组织需要传递的文件、传单和书信等，不少就是通过李振亚及时送到各站联络员手里，使党的指示得到迅速传达。

1941年，在日伪“清乡”前夕，有一天，常熟城内的一个联络员王大二交给李振亚一份文件，嘱咐李一定要亲自送交“民抗”司令部。当轮船在董浜站靠岸时，李振亚身穿一套破衣服，藏着文件，手提一只放有杂物的篮子，直向董浜镇东一里许的一个村庄走去，找到了“民抗”司令部，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1942年初冬，有一天，吴常班轮船开过雪沟塘，碰上日寇拦船搜查，叫乘客统统上岸。其中有几个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上岸时未及时将进步报纸藏好，李振亚发现后，就迅速地把它收起来藏在船舱夹板下，日寇搜查，没被发现。李振亚并向日寇打招呼说：“船上乘的统统是良民。”日寇也就让所有乘客上船，将轮船放行了。

时隔不久的又一天，一群日寇和便衣伪军乘上吴常班轮船到常熟城里去。李振亚想，如果今天沿途各站有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上船，万一被日寇、伪军认出来，后果就不堪设想。于是在轮船将驶近每个码头时，李振亚就登在船头上了望。当轮船向董浜开去，李振亚正好望见陆祖林等几个“民抗”队员候在码头上，李振亚急忙打手语叫他们迅速离开，避免与日寇、伪军的接触。

李振亚有时还要协助中共地下党装运武器和物资，将这些武器、物资全部伪装包扎好，不露一点可疑迹象。当轮船到达卸货的站上时，李就关照驾驶员一定让这些武器、物资的押运人员和站上的接收人员完成交接任务后，拉响汽笛开船。在敌人眼皮下，水上交通线工作搞得得心应手。

史料提供人 李振亚 唐树德 夏仁华 核实整理人 朱绍曾

倪南施计保护抗日女干部

倪南，女，1890年生，原徐市镇人，后婚嫁至吴市镇周桥村高

家。贫苦农民。 1964 年去世。

1941 年 7 月,日伪对中共苏常太抗日游击根据地实行“清乡”,民众不能随便行动,平时讨饭的倪南也不便外出。一天下午,忽然从门口走进一个年轻女子,大约 20 岁光景,面目清秀,像城市里的女学生。倪南问她找啥人,那个女青年回答说:“日伪军出来‘清乡’,我从徐市那边过来的,想在老大娘这里歇歇脚,暂住一段时间。”这时,有个叫王二的偷偷地跑到曾在抗日民主政府工作、最近被疏散在家的顾金山家,叫他去看看是否认得那个女子。傍晚,顾金山走进倪家,刚和那女子打了个照面,那女子就一把抓住顾金山说:“顾同志,你认得我吗?我叫张黎呀!”老顾仔细一看,果然是张黎,原来张黎和顾金山在抗日民主政府共过事,一起干过财经工作,所以一见如故。张黎的真名叫张美华,宁波人,父亲在上海经商。

从此,倪南和张黎像母女一样相依为命,张家巷上的乡亲不时接济她们衣食。张黎会做群众工作,很受群众欢迎。她穿了土布衣服,俨然像一个农家姑娘。倪南很爱张黎,希望她能早日回到父母身边。但当时交通不便,更为麻烦的是日伪设置重重关卡,盘查过往行人,没有“良民证”的就要被抓起来。张黎是隐蔽于此的外地人,无法领到“良民证”,也就无法外出,更不要想去上海了。倪南托人去找当地的伪保长,要求领一张“良民证”。那个伪保长表示大家都是中国人,能帮忙总要帮忙,但没有一定理由怎么能为一个外地女子领“良民证”呢?为此,倪南日夜操心。

过了一个来月,在上海打工的倪南的儿子高和尚回来探望母亲,看到家里多了个陌生姑娘,真是又忧又喜,忧的是母亲一个人生活尚且困难,负担两个人生活更是艰难,何况此人是地下工作人员,会带来一定风险;喜的是母亲有了个伴,可稍解寂寞。老人看到儿子和张黎站在一起,活像一对小夫妻,马上想起何不把张黎当作自己的儿媳妇,这不是有理由为张黎领“良民证”了吗?她先和儿子商量,要儿子假称回来“讨娘子”,与张黎做假夫妻,目的是让张黎领到“良民证”,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保证安全。高和尚是个纯